

胡適與李大釗 (下)

● 黃艾仁 (大陸作家)

謹防假冒受騙上當

從這段話裏，他再次明白宣稱他所攻擊的主要對象是那些藉種種「主義」來騙人害人的軍閥政客等妄人。其意在於「謹防假冒，受騙上當」。而不是反對對於主義的研究與外來主義的輸入。他在許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篇文章中，實際上已作了明白的交代。他說：「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着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他在《四論問題與主義》中，又對輸入學理的方法，發表了三個意見：①「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那發生這種學說的時勢情形」；②「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學術影響」；③「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每種學說所已經發生的效果」。胡適的這些意見，現在看來，仍有其參考的價值。

值得指出的是，胡適在論述的過程中，他也

坦率地表白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他認為「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涵意義的表現，不單是這學說本身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關係了。這種唯物的歷史觀，能否證明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現在已不成問題，因為現在社會主義的根據地，已不靠這種帶着海智兒臭味的歷史哲學了」。無可諱言，胡適當時具有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是符合當時倡導者所宣傳的革命理論。然而，與此同時，他却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觀點，來否認強調階級鬥爭的必要性。毫無疑問，這是與胡適一貫宣傳的非暴力革命的主張一脈相承的。說明他對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頑固性與反動性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的歷史實際沒有全面的理解；說明在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上，他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是相對立的，這對於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是不利的。因此，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他受到批判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從胡適當時的言行以及以後的一段時間的表現來考察，他還不是以敵

對的情緒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從學術上的不同觀點來提出不同的看法。

政治觀點非全對立

(三)從胡適「文章」發表後的反響看：胡適的「文章」發表後，雖然有藍志光、李大釗的批評，但是在進步的營壘中，同意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看法，可說是不乏其人。即使是李大釗批駁的文章中，也坦白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向去作」。可見，李大釗當時也不否認存在空談主義的偏向。曾親聆李大釗教誨的毛澤東，當時也是同意這一看法的。所以，胡適在《每周評論》發表文章不到兩個月，毛澤東便在湖南成立「問題研究會」，並印發《問題研究會章程》。為了廣為宣傳，毛澤東還寄了十幾份「章程」給在北京大學學習的鄧中夏。鄧中夏說：「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說很好，有研究的必要」。所以，便將「章程」全文刊登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廿三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可見，胡適文章發表後，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如惲代英

在一九一九年八、九月間的《日記》中，仍然還是對胡適懷有好感，視之為「皆我聯絡美勢力，以得正當助力之企謀」。並且說：「這美勢力是中國各方面歡迎的，很信中國一定可以靠他們得救」。所有這些，不言而喻，不難看出當時胡適在進步青年中的聲望不是因那篇「文章」的發表而下降了，倒是因那篇「文章」的爭論反而在青年中的影響更為廣泛了。

因為在此之前，北洋軍閥就有人傳言胡適是「過激黨」，從這些現象看，傳言也不是毫無依據的。所以，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的文章中，也談到胡適的確「橫被過激黨的誣名」。指出其原因之一是，胡適與陳獨秀都同意在《新青年》發表李大釗的《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等政治色彩極為鮮明的文章。因此，李大釗在該文不無遺憾地說：「這真是我的罪過了」。從這裏也可看出，當時胡適與李大釗在政治觀點上不是完全對立的。至少可以說，他是同意李大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否則，在一九一九年間，李大釗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是不會這麼說：「你與《新青年》有不可分的關係，以後我們決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評論》的人結合起來，為文學革新的奮鬥。在這團體中，固然也有許多主張不盡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個團結像這樣顏色相同的，恐怕不容易了」，「所以我們應該結合起來向前猛進」。

從這段話中，不僅說明李大釗具有胸懷寬廣的求同存異的思想，同時也充分肯定了胡適在《新青年》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顏色相同」的

傾向。應該說，這就是李大釗與胡適之間友誼來往的思想基礎。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這次的意見分歧，可說是在反對建反軍閥的大方向一致的基礎上的一次坦率地論辯，也可說是統一戰線內部由於思想認識的不同而引起的自由討論。如果我們一定要把它提高到是一場敵對性質的論戰，那就難於解釋論戰前或論戰後他們之間並肩戰鬥的密切關係了。

不避險惡宣言造反

（四）從「論戰」後胡適的言行看：《問題與主義》的文章在《每周評論》發表不久，胡適的《四論問題與主義》還未付印出版，即被北洋軍閥查封了。從這件事，也足以說明陳獨秀被捕後，由胡適主編的《每周評論》的政治態度了。有人說，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作為他自己的反動宣言，向當時反動透頂的段政府投降」。如果這是符合事實的話，那為什麼在「反動宣言」發表之後不久就遭到反動軍閥封閉呢？這是很難目圓其說的。我們還可看到，《每周評論》被查封後，胡適即作《樂觀》一詩，先後發表在《星期評論》與《新青年》雜誌上。該詩不僅把北洋軍閥得意妄形的醜態淋漓盡致地揭露出來，而且充滿信心地預期：《每周評論》這棵大樹雖然被砍倒了，但是它所播下的種子，終有一天還會在地上吐芽、生根、開花、結果，再次長成參天大樹！那時：「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聰明的小鳥，在樹上歌唱，——那斫樹的人到哪裏去了？」

在這裏，胡適在詩中的寓意是極其明白的，無須多作解釋。胡適在這首詩前，還附上一短序：「《每周評論》於八月三十日被封禁，國內的報紙很多替我們抱不平的。我做這首詩謝絕他們」。這首詩寫於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距《每周評論》被封閉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月，其不屈不撓的鬥志，其執著追求的理想，在當時新文化的營壘中，可說是罕見的佼佼者。其後，他又發表了《一顆遭劫的星》、《示威》等義形於色的詩篇，充分表現了他那大無畏的戰鬥精神。

在此之前，大家知道，陳獨秀因散發《告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其實，「作案」的豈止陳獨秀一人。現已有人著文披露：李大釗、高一涵、胡適都是參預其事的。胡適不僅是用英文譯出《告北京市民宣言》的執筆者，而且還散發了九張傳單。按理說，陳獨秀被捕後，胡適應處處小心謹慎以避免懷疑才是，但胡適並非如此怯弱，他不僅為營救陳獨秀奔波，而且公然寫出《威權》一詩，發表在《新青年》六卷六號上。一九二〇年《嘗試集》再版時，他還特地附上跋語：「九年六月十一夜，是夜陳獨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後，某報館電話來，說日本東京有大罷工舉動」。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嗎？如果他不是飽含激情、壯大了胆，他怎能會在詩中大聲疾呼：「我們要造反了」！號召：「奴隸們同心合力，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期待：「山腳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呢？歷史說明：用這樣的語言，這樣的情緒來表達對當時反動統治者的仇恨心情，在當時進步

的詩歌中也是不多見的。聽其言，觀其行，縱觀胡適當時的思想實際，說他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同認識是符合事實的。但說他是懷有惡意地向馬克思主義發動一次猖狂的進攻，那是與當時胡適的言行不相一致的。

胡適日記看出真情

我們單查看一九二二年五月至八月間的《胡適日記》，便可從以下的記載中清楚地看到胡適與李大釗（字守常）之間的交往是何等的密切：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今日告假……做一篇《我們的主張》，是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這本是想專為《努力》做的；後來我想此文頗可用為一個公開的宣言，故半夜脫稿時，打電話與守常商議，定明日在蔡先生家會議，邀幾個「好人」加入。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

上課。守常從保定回來，帶來邊守靖、吳景濂、張紹曾等搗鬼的電文十二件，我把他們編成一篇文章，在《努力》上發表。守常說，吳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點。其實政治手腕也很難說，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勝似吳佩孚的拙。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上課。孫丹林（漢塵）來京，現暫就內務次長的事，他要和我們談談，故守常約我和子文，

石曾同他吃飯。此人是吳佩孚的諸葛亮；……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

到大學辦事。與守常談。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晚邀守常來談政事。久不出門，竟不知國事鬧到什麼地步。守常談甚久，我們都覺得現狀可危。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前晚始知獨秀在上海被法捕房拘捕。守常有電去問，至今還不知詳情。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我觀察近來的政局，心裏着實不安。今夜打電話給守常，勸他規戒孫丹林、白涅亞們不要瞎搗了，必須鎮靜的看出一條路來，然後下子。守常打電話去告訴孫丹林、孫約明晚邀蔡先生們一談。孟鄒有快信來，說獨秀案十一日開庭，法捕房呈出許多證據，公堂不准交保。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

晚七時，到大陸飯店會着孫丹林、同座有子民、爾和、夢麟、守常。我們談的都是很懇切的忠告。孫的態度很不好。他似乎還在那兒做「武力統一」的迷夢。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寫一長信給顧少川（顧維鈞），詳說獨秀案內證據，並說法國人近年作的事，實在大傷中國青年的感情，——指昨日十個革命團體敬告國人書為證，——請他以此意勸告法公使，請他們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夜七時，守常請俄國新代表約佛（Yoffe 即越飛）吃飯，同來的有莫斯科大學中國學者 Iwants 及參贊二人。陪客的有子民、孟和、石曾、夢麟。子文有演說，我也演說了幾句，約佛作答。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夜間俄國代表團長姚表（Yofe）請吃飯，姚表作極長的演說……

事實說明，從以上胡適的日記中，不僅可以看出胡適與李大釗之間的關係，即使在爭論之後，仍然是極其融洽的，表明當時他們的政治態度基本上是協調的，他們對陳獨秀的營救是出過力的。我們還可從李大釗給胡適的書信中看到，甚至有關黨內的機密，如一九二二年八月李大釗到上海與孫中山、陳獨秀密談的情況，李大釗在胡適的信中，都毫無掩飾地表述出來。如果胡適當時是站在反動派一邊，為虎作倀，充當反動派的輿論工具，可以斷言，李大釗是不會那樣熱情地對待他的。李大釗之所以與胡適那樣友好相處、坦誠相見，特別是一九二二年七、八月間以來，

(下) 胡適與李大釗

他們之間的交往尤為密切。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那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明確提出與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理由是：「無產階級未能獲得政權以前，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歷史進化的過程，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够建設民主政治為止」。這就是發表在《先驅》雜誌第九號上，題為《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一文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因此，李大釗對胡適團結爭取的態度，可以說絕不是出於單純的私人感情，而應視之為這是黨內賦予他為「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所要完成的使命。

道經俄京並無偏見

事實說明，當時李大釗對胡適所做的爭取工作是細致的。例如一九二六年七月胡適要赴歐洲參加英庚款會議，李大釗就建議胡適取道莫斯科，希望胡適到莫斯科參觀訪問，提高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感性認識。我們從胡適在莫斯科期間給張慰慈、徐志摩所寫的五封書信中可以看出，他雖然宣稱自己是以實驗主義的眼光來進行觀察的，「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但是有些話從當時看來，還是較公允的。為了說明問題，不妨摘錄數則如下：

(1) 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却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蘇俄雖是狄克推多，但他們却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見胡適致張慰慈的第二封信）

(2) 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見胡適致張慰慈的第三封信）

(3) 我在莫斯科三天，覺得那裏的人有一種 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愧死。（見胡適致徐志摩的第一封信）

(4) 今年 Trotsky 著《俄國往那兒走》（Whither Russia?）一書說，蘇俄的生死關頭全靠他不能製造出貨物，比美國還要便宜還要好。他承認，此時還做不到；但他同時承認此事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也許笑他痴心妄想，但這又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我們不能單靠我們的成見就武斷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能有偉大的生產力。（見胡適致徐志摩的第二封信）

(5) 列寧一班人，都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要救國，應該從思想學問下手。（見胡適致徐志摩的第二封信）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胡適當時對社會主義

的蘇聯，並沒有完全採取否定或敵視的態度，而是在不少地方作了客觀的反映與積極的肯定，是擺脫了當時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持的形式主義看問題的偏見。正因為這樣，李大釗為了使胡適的思想轉變到社會主義的軌道上來，他敦促北京朋友寫信給胡適「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胡適說，這是李大釗被捕前的一兩月對北京朋友說的，「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可見，李大釗生前對胡適是極其關懷的。他不因胡適對馬克思主義持有不同的認識而與之疏遠，相反的他愈加熱切地接近他、團結他、尊重他。正是由於李大釗以這種「求同存異」的豁達胸懷對待他，使得胡適久久不能忘懷，終生視之為誠摯的朋友。

風雲變幻情誼不渝

李大釗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被張作霖的軍警所逮捕，同年四月廿八日犧牲的。其靈柩暫時停放在宣武門外的長椿寺內，直至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三日，在地下黨組織精心策劃下，才由長椿寺移送到萬安公墓安葬。在此之前，北京文化界及李大釗生前友好曾積極為之籌措喪葬費，當時胡適也參預其中，與劉半農、錢玄同等各捐二十元，其收據原件至今仍存在中國革命博物館保管部。據李時雨在《轟動北平城的李大釗葬禮》一文所說，出殯那天，「反動軍警從四面八方衝擊送葬的羣衆，他們像瘋狗一樣，踢翻了祭桌，毆打朗誦祭文的人，用槍托打散送葬的羣衆。他們打傷了數百人，逮捕了幾十人」。可見，當時的

北京政府與一九二七年的反動軍閥在對待革命黨人的態度上是一致的，其採取的手段是殘酷的。所以，當時凡是與李大釗生前有來往的人，爲了避嫌或免遭迫害，往往以緘言不語或隱匿身分來保全自己。但是胡適却没有這樣做。他對犧牲後的李大釗的態度是極其明朗的，他從不隱瞞與李大釗有過一段親密往來的歷史，他公開宣稱李大釗是他的朋友、同事，稱譽他是一位革命家。最爲明顯的是，一九三〇年《胡適文存》第三集公開出版時，胡適特地在《文存》的首頁上親筆題寫：「紀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釗先生、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單不庵先生」。很清楚，胡適這四位朋友中，只有李大釗是與當時執政者相敵對的，而其他三位都是屬於爲時人所推崇的學者。不言而喻，胡適這樣秉筆直書是爲當權者所忌諱的。可說是在老虎面前故意開玩笑。從這裏，也可看出，胡適與李大釗政見不同，但私人間的感情却是深厚的。一九三二年六月間，李大釗夫人趙幼蘭爲了向北大索取李大釗生前的薪金，以緩解生活上的困難，特地寫信給胡適，請胡適代與學校當局交涉，爭取多增發或延長發給時間。信的最後說：「這些事都請先生費心給辦辦？因爲先生從前與守常先生是好朋友，故敢這樣的求先生」。顯然，這不是一般的客套，而是發自內心的表達。我們還從周作人給胡適的信中知悉，同年八月，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爲了出售李大釗的遺留書籍，也曾請求胡適代爲設法接洽，以濟燃眉之急。所有這些，都說明了胡適的確「與守常先生是好朋友」，否則李大釗的親屬

是不會那樣不止一次地向胡適提出求助的。

雖經論戰無損友誼

值得指出的是，胡適離開大陸之後，他的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他公然站在維護蔣政權的一邊，發表了一系列反共言論，這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認的。但是，在這些言論中，我們却很難找到他對李大釗有不敬之處。相反的，他在回憶與李大釗、陳獨秀共事的歲月時，還能以較客觀的態度作出評論。他說，李大釗是中國早期擁護「布爾什維克」者之一，「李大釗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間，已經開始寫文章稱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了」，「陳獨秀在一九一九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早期的著作裏，他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所以陳獨秀比起李大釗來在信仰社會主義方面却是一位後進」。因此，

李大釗對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的批駁，胡適一直認爲這並不是私人間有何惡感而引起的，而是「從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新信徒的觀點出發的」，「從一個革命家，一個社會革命信徒的立場出發的」。基於這種理性的認識與理解，所以無論是胡適或李大釗都不因那場「論戰」而疏遠，以至淡化了他們之間的友誼關係，相反的，却由於李大釗的那種「鬥爭結盟友」，「沒有宗派氣」的豁達胸懷，促使胡適對於李大釗有了更深的瞭解。借用巴金在一九二七年所寫的《李大釗確是一個殉道者》中的話來說，那就是：「在主義上，他雖是我的敵人，在行爲上，我對於他却極爲欽佩」。這就是胡適與李大釗經過一場「論戰」之後，仍然以誠摯的態度友好相處的真諦！

（因篇幅所限，註釋文字省略未刊請讀者原諒。）

聖文 拾夢抒懷

隆重 李 潔 著
出版 新臺幣壹佰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滙爲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 聖文書局帳戶。